

毛泽东、朱德指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磨盘战术”打败十倍之敌

■褚 银

记 史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硝烟刚刚散去，蒋介石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围剿”。他认为，前两次“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参加“围剿”的部队都不是嫡系部队，所以“围剿”不力。于是，他一面令其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部队固守和恢复阵地，一面令其嫡系部队第6、第9、第10、第11、第14师由河南、湖北等省迅速进入江西，担任“围剿”主力军。这次“围剿”的总兵力达23个师又3个旅，外加5个航空兵队，共30万人。蒋介石亲任“围剿”军总司令，任命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同时聘请英、日、德等国军事顾问随军筹划。

鉴于第二次“围剿”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遭到失败，蒋介石决定这次“围剿”改取“长驱直入”的战略，首先击破红一方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摧毁苏区。7月1日，蒋介石正式下达进攻命令。30万国民党军队分成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以乌云压城之势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

红军虽然早已预见蒋介石还要进行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想到会来得如此之快。从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到第三次“围剿”开始，中间相隔只有一个月。原以为敌人经过第二次“围剿”的失败，至少需要重振旗鼓，不可能马上组织新的进攻，所以红军尚未进行新的反“围剿”准备。以致当敌人开始进攻时，红军正分散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开展群众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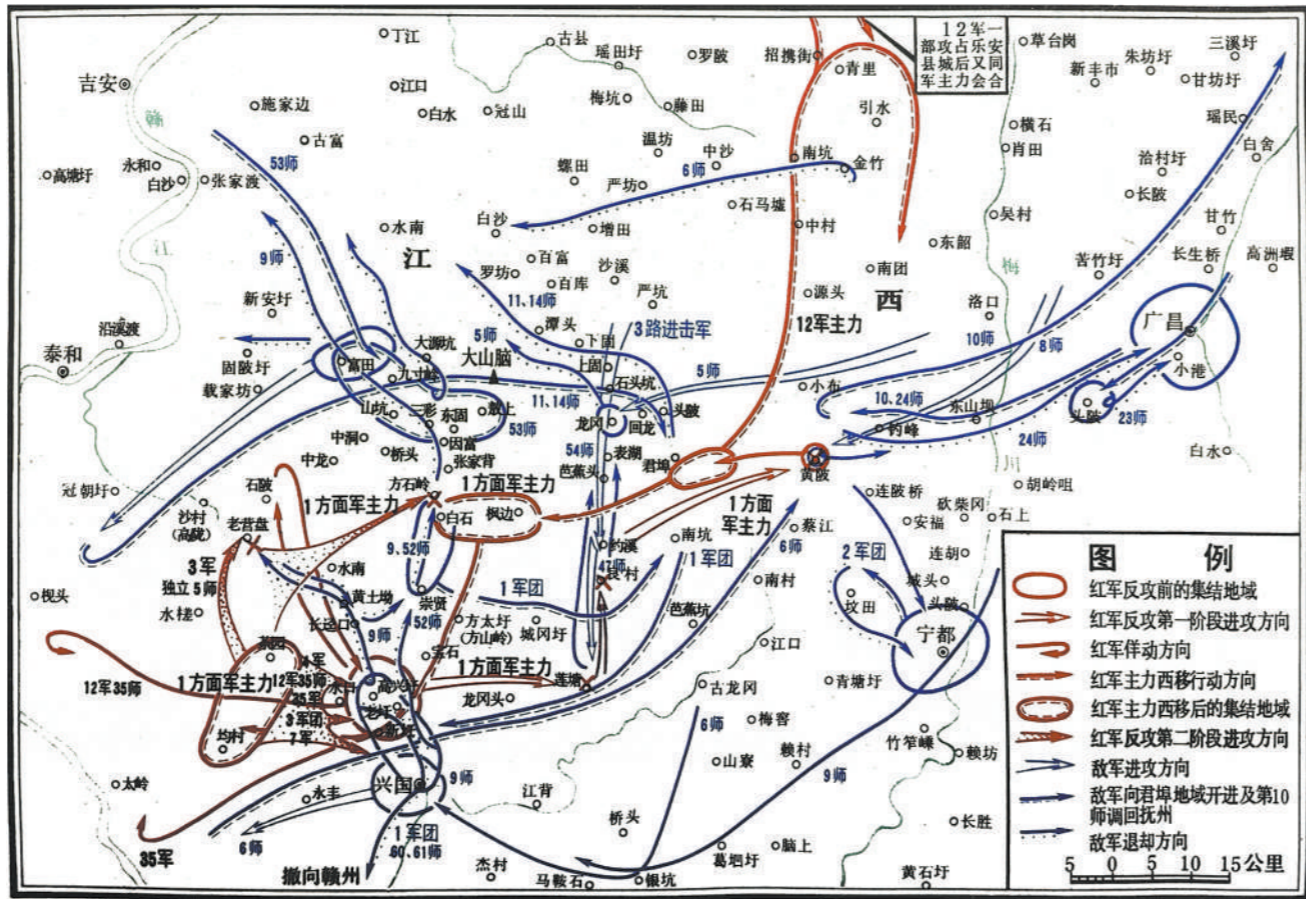
面对新的“围剿”，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把正在闽西的红军主力迅速收拢，绕道千里，回师赣南，诱敌深入至兴国、于都、宁都、瑞金预定的作战地区，待机破敌，以打破第三次“围剿”。

国民党军行动迅速，很快深入苏区腹地。红军主力向赣南苏区前部和腹部集中已来不及，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采取“磨盘战术”，红军向南迂回，避开敌军进攻锋芒，从中央苏区南部插入敌军背后。毛泽东、朱德率部队从建宁地区分路出发，侧敌行军，绕道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脉，向西南急进，回师赣南。

7月2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于都县北面的银坑、琵琶垄、平安寨、桥头地区，隐蔽在深山峡谷中，同红3军主力、红35军和由广西突围后转战到江西的红7军会合。24日，毛泽东、朱德在于都县银坑下达《消灭由赣东进攻之敌的命令》。接着，又继续向西北隐蔽转移。28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兴国西北高兴圩地区，绕道行军数百里，完成了由闽西北向赣南战略退却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面对十倍的来犯之敌，红一方面军先放弃一座座城池。而蒋介石却洋洋得意地坐在南昌行营里每天收到雪片般的捷报：广昌、宁都、富田、水南、白沙、沙溪、中沙、大金竹、陂头相继占领。当发觉红军主力已转移到其侧后的兴国地区，并判断红军可能西渡赣江，他立即命令其主力9个师的兵力分路围攻过来，企图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毛泽东、朱德获悉这一情况，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作战方针。判断敌军虽然来势很猛，但因其在地被拖了近一



个月，锐气已减，且其主要兵力在第一线，由富田向东的后方联络线上防守兵力比较薄弱，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击虚弱。”

31日，毛泽东、朱德接到红12军军部的报告，得知敌军主力向兴国方向急进，其右后富田、陂头、新安一带仅留三个团防守。傍晚，毛泽东、朱德在高兴圩发布《夺取富田、新安的命令》，决定方面军“以绕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的企图，决定夺取富田、新安”。当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奉令北进，先头部队进到石陂以北地区。这时敌军已抢先赶到富田。鉴于夺取富田的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果断改变计划，率部悄然折回高兴圩地区，另寻歼敌机会。

8月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泰和县沙村。在这里审问由第12军送来的两个敌探，进一步证实了红军侦察排获得的情报：红军在向富田开进时，敌人的飞机侦察到红军迂回其侧后的意图，马上调动两个主力师增援富田。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决定将迂回敌侧后的战法改为中间突破，以红军主力向兴国东部的莲塘、永丰县良村、宁都县黄陂方向突进，全歼正向莲塘方向前进的战斗力较弱的敌军，然后进击龙冈、黄陂，于运动中逐个歼灭。

为了隐蔽红军意图，造成敌人错觉，临时总前委命令红35军、红12军第35师和部分地方武装伪装成主力红军向赣江方向佯动，迷惑敌人继续向西追击。5日夜，红一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在夜幕的掩护下，从崇贤和兴国两地之间约20公里的空隙地带，冒着绵绵细雨，翻越崇山峻岭，迅速向东穿插。经过一夜又半天的急行军，于6日中午到达莲塘、官田地区，隐蔽在附近山上的密林中。对于红军的这一军事行动，蒋介石毫无察觉，仍然驱兵向西、向南昼夜行军，以为红军还在西边。

7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将敌

第47师第2旅和由良村西出侦察的一个多营全歼，取得初战胜利。随后北进，攻打良村之敌第54师，歼灭该师大部，击毙该师副师长及参谋长。良村战斗后，红一方面军以红3军佯攻龙冈，其主力挥师东进，在宁都黄陂歼灭敌军第8师约4个团。

5天之内，红一方面军主力连续打了三个胜仗，共歼敌万余人，夺得了主动权。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各路部队迅速东进，从四面八方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向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围攻过来，并下令“以东固为中心，纵横25里一律平毁，格杀无余”。

蒋介石前几次用兵都采用合围办法，结果总是被毛泽东在运动中寻找到空隙，化险为夷。他感到与红军较量时，时间与速度十分重要，故采取“先声夺人、四面合击”的战略。他调集重兵，分别由西北、西南、东南和东北方向进逼。红军再次陷入敌重兵包围之中，这是第三次反“围剿”以来最困难的时节。

13日晚，毛泽东、朱德在君埠一座家庙里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会议决定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用一部分兵力牵制敌军，以掩护红军主力西进至兴国北部和西部隐蔽待机。会后，鉴于蒋介石害怕红军北攻临川的心理，毛泽东、朱德令红12军（欠第35师）伪装成红军主力向吉安佯动，指示其白天行军，大造红军主力北攻临川之假相，吸引敌军向东北方向调动。

国民党军误认为红12军为红一方面军主力，并判断红军将进攻宜黄、威胁临川。蒋介石急调第10师赶往临川防守，急令第6师、第18军等部尾追。红12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故意采取走走停停的办法，同敌军保持不离不弃的距离，紧紧地牵着敌人的鼻子。同时，他们专走崎岖难行的山路，忽东忽西，一步步地疲惫了敌军，就这样将国民党军主力拖了半个月的时间，掩护了红一方面军主力的西移和休整。

朱德谈起这次突围的情景时说：我们在敌人两路夹攻、不到20里宽的区域内转移出去，进退自如，打得相当巧妙，这都是由于群众条件优越，将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弄得敌人疲惫不堪。

12月，林朝将短短十几天时间搜集到的全部情报汇报给了吕朗。吕朗用米汤将内容写在草纸上，这种用特殊方式书写的信件即为密写信。晾干后纸上没有任何字迹，阅读时只需用碘酒擦拭草纸，字迹即可清晰地跃然纸上。

吕朗迅速地将密写信送往工委机关。当到达工委驻地小芦庄村时，因紧急敌情，工委已临时转移。吕朗发现有敌人巡察，急中生智用多层油纸把密写信包裹好，深埋于村里一个居民院内，匆匆离开。幸好他及时与工委接上头，将信中内容口头汇报给工委。

时光荏苒，上世纪80年代，原地下党员再度聚首塘沽，追忆往事，回想起当年埋在小芦庄村的密写信。经挖掘，密写信重见天日。这封保存下来的密写信，是我党地下党员艰苦卓绝斗争的直接物证。

左上图：1948年12月，我党地下交通员用米汤书写的密写信。

平津战役纪念馆供图

国民党军主力跟在红12军后面奔波近半个月，才发现不是红军主力，只好掉头西进。而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在兴国白石、枫边一带休整了近半个月。敌人被红军牵着鼻子在根据地里打转转，弄得饥饿沮丧，疲于奔命。正如当时缴获的国民党军官家信中所说：这一个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比出发时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

此时，国民党军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粤桂军阀利用国民党中央军深陷苏区之际，出兵湖南，对蒋介石构成威胁，蒋介石不得不结束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下令各路军队撤退。

红军乘胜追击退却之敌，又打了两个胜仗：9月7日，红3军、独立第5师在兴国与泰和县交界的老营盘歼灭北撤的敌第9师，全歼其独立旅3个团。1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东固以南的方石岭、张家背附近，全歼敌第52师及第9师的1个炮兵团。

这次战斗结束后，红3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突遭敌机轰炸，不幸牺牲，时年33岁。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了5个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蒋介石哀叹：我们是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30万兵，打不过他们3万兵。针对蒋介石的疑问，毛泽东给出了答案：“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

对这次反“围剿”，彭德怀给予高度的评价：这次战役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毛主席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崭新的战略战术。

上图：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反攻经过要图（1931年8月1日—9月15日）。资料图片

图片制作：周永昊

一封掩埋30余年的密写信

■曹 静

军史撷珍

平津战役纪念馆中陈列着一份乍看并不起眼的草纸。纸张呈黄褐色，边缘残破。这是一封掩埋地下30余年的密写信，它正为我们讲述着一段传奇般的真实历史故事……

1948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扣留并歼灭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的作战方针。

为贯彻执行军委决策，中共冀东区委天津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选派林朝打入塘沽，吕朗则是我党的地下交通员，负责向天津市内地下党传达



消息。组织上特许林朝和吕朗之间进行横向联系，担负塘沽与工委之间的情报传递。

11月下旬，吕朗带来工委的指示，要求积极搜集敌军兵力、防守部署等情况和提供塘大地图，为解放塘沽做准备。

我军政治整训历史回眸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七七事变”（亦称“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在这存亡绝续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集合在陕北地区的红军主力已枕戈待旦，时刻准备着投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

斯诺曾经问毛泽东：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呢？毛泽东回答：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完成。

作为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力刚刚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冲杀出来，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就毅然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依然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为尽快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快国共合作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在7月15日向南京国民政府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邓小平：关于红军总政治部起草的《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组织的决定》稿和《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稿，“组织决定一项可用”；“红军政治工作决定依目前情况须加修改，为着重新直接对抗日战线的政治工作，望即重新起草”。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邓小平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迅速组织重新起草《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红军即将投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如何适应新的形势任务需要，尽快完成改编工作的重要议题。

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里，几盏油灯彻夜未熄，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的目光都投向地图上的同一个点，仿佛在倾听华北平原的隆隆炮声。

云阳，位于泾阳县北部。这里北靠嵯峨山脉，南望八百里秦川，左挽通信陕北之要道，右控到达西北之要冲，冶峪河水从背后悠悠东流。

7月8日，在陕西云阳红军前方司令部，总指挥彭德怀、总政治委员任弼时、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致电各兵团首长，告以卢沟桥事变情形，部署各兵团加紧抗日宣传，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出兵援助第29军，红军愿为抗日先驱。并根据毛泽东、朱德的要求，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加紧红军改编迅速开展抗日前线。

22日，会议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的云阳镇南门文家大院召开。任弼时首先报告了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国内外形势，指出：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事变的前途一是南京当局屈服，或是部分抵抗后和日本签订和约；一是在全国民众强烈的抗日要求下，促使政府实行全面总动员；后者是我们应争取的前途；战争可能是长期的，红军的改编有利于发展和推动统一战线下的全面抗日。

同日，彭德怀作了题为《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总结红军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说明红军改编的意义；提出红军即将进入民族抗日战场，进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环境，和过去十年血战的阶级敌人共同抗日；在这个战略转变的关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彭德怀回顾了红军十年艰苦斗争的历史，告诉大家，改编后要保障党对红军的单一领导、绝对领导，没有党就没有红军，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23日，朱德到达云阳镇后，与彭德怀、任弼时一起主持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的内容和部队思想政治情况，对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要求等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强调要通过加强政治工作，保证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绝对领导。他说：红军改编换了旗号和帽徽后，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如有人对改编的意义不了解，发

生动摇，要解决、克服这些问题，就要做好解释工作。

会议还讨论了重新起草的《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突出了政治工作直接为抗战服务的指导思想和内容，提出新阶段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一切工作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抗战的胜利；第二，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第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造就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决定》指出在新的环境中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更重了，要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也始终应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这个决定为红军改编后的政治工作明确了任务，指明了方向。

云阳会议对红军参军、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对于红军的改编工作，以及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保证部队党的工作的地位，保证将政治工作贯穿于部队的行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为挽救华北危局，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誓师出征，挺进抗日前线。

9月6日，八路军总部抗日誓师大会在云阳镇举行。部队在操场上集结，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贴着“坚决拥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大横幅。当地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各界人士和群众挥舞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的三角小彩旗，从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汇集而来，偌大的会场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朱德率全体指战员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当天，八路军总部冒雨从云阳镇出发，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云阳会议：红军改编前的政治总动员

■刘子君

